



作家的童年

13

● 陈 模

● 柳 杞

● 刘厚明

● 黄庆云

● 赵燕翼

● 张庆田

● 陆 地



作家的童年

已

- | | |
|------|------|
| ● 童年 | ● 童年 |
| ● 童年 | ● 童年 |
| ● 童年 | ● 童年 |
| ● 童年 | ● 童年 |
| ● 童年 | ● 童年 |

《童年文库》
作家的童年^⑬

*

青春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.125 插页9 字数102,000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9,2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190 定价：0.59元

编 者 的 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，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、增添了荣誉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——童年的。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？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童年文库》，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、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、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，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。

《童年文库》包括《作家的童年》、《艺术家的童年》、《科学家的童年》、《冠军的童年》等丛书。《作家的童年》收有我国当代作家撰写的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。这些文章除个别已去世的老作家由别人代为整理外，均由作家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成。在每篇文章前，都附有作家的照片、手迹、简历和主要著作，使小读者们见人、见字、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，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。

本丛书拟分若干集，每集约八——十万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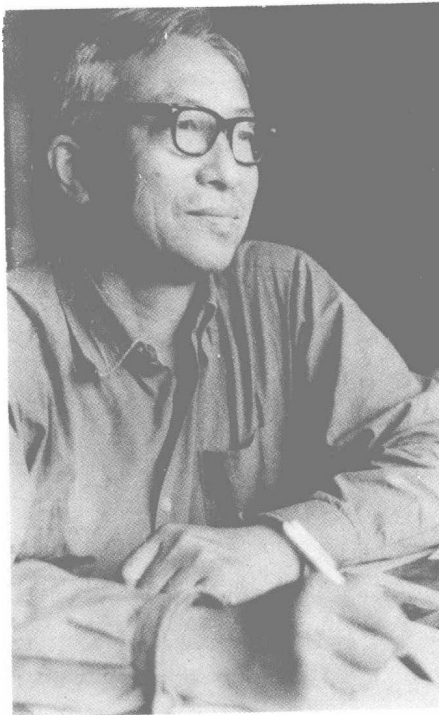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、作协和各省市自治

区文联、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；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关怀，在这里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本集收入作家陈模、刘厚明、赵燕翼、陆地、柳杞、黄庆云、张庆田撰写的童年回忆。

新蕾出版社编辑部

老师，是一种崇高的职业。在社会上，他们是受人尊敬的。我对刘薇圃老师，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她像我的慈母，又是我的人生引路人。去年三月二十五日，刘老师不幸逝世了。我在万分悲痛之时，不禁忆起她的往事，尽管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可是，一桩一、一件，仍然是那样清晰。她那果敢、无私、亲切的形象，真切地活现在我的眼前。



一九八二年五月摄

陈模

孩子剧团团员陈模帮助吴培尼
改作文（一九三九年）



目 录

难忘的童年	陈 模 (2)
记忆中的童年	刘厚明 (24)
木马记 ——童年纪事之一	赵燕翼 (52)
故乡与童年 ——逝水年华之一	陆 地 (64)
最初的记忆花束	柳 杞 (80)
最初的信息	黄庆云 (96)
年近花甲忆童年	张庆田 (110)

陈模的简历和主要著作

陈模，1922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口岸镇后园村。从小读私塾。1933年后随家逃荒到上海，1937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儿童剧团，任干事会干事。1938年5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1年2月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。1946年后任吉林桦甸县城区、二区和四区区委书记、武工队政委、共青团哈尔滨市市委书记、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。1951年后任《中国青年报》副总编辑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。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。主要著作有：短篇小说《台儿庄的小战士》；长篇小说《奇花》；中篇小说《爱的火焰》、《凤凰山女儿》；散文集《心灵的火光》及《南斯拉夫游记》等。

难忘的童年

陈 模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忘的，我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、在抗战的烈火中成长的。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，每一回忆起来，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……

爱听民间故事

我是江苏省泰兴县人。我的家住在口岸镇的后园村。清清的里下河从村旁流过，河里经常行驶着来往的木船。这里离长江边只有几里地远，土地肥沃，盛产小麦、稻米、蚕茧、生猪，号称鱼米之乡。

家乡虽然富庶，可我的家境却很贫寒。我的父亲长年当雇工，后来弟兄们分家，他分得二亩薄田。父亲会种田、种菜、打鱼，但由于家里人口多，经不起荒年，还是负债累累。我记得，每到年关，爸爸都要躲债跑出去。有一年年三十的下午，爸爸躲债还没回家，一家人都为他揪着心。天渐渐地黑了，凛冽的北风呼啸着，茅草屋里很冷，豆油灯的小火苗，在微风中摇曳着……

“嘭！嘭！”门上响起两下很重的敲门声，“开门，快开

门！”

妈妈开了门，进来两个穿黑衣服的警察，我的心象被铁钩子抓着一样，浑身凉了半截。

警察对妈妈说：“你们欠债不还，人家告下你们啦！快跟我们走吧！”

就这样，妈妈被带走了，我们几个孩子吓得嚎哭起来，爸爸妈妈都不在家，这年可怎么过呀？

妈妈被关进牢房。第二天中午，我们才被允许去送饭。牢房里关满了穷人，他们穿得破破烂烂，全是愁眉苦脸的。爸爸好容易找了两个保人，把妈妈保出来，条件是限期还债。家里连可卖的东西也没有，只有把地典出去了。

春打六九头。天气一暖和，树枝上也吐绿啦。我们和好多穷人家一样，缸里没有粮食吃了。地里的野菜、榆树上的皮，都被穷人吃得精光。乡亲们纷纷拿上篮子，带着铁铲子，到七里外一个小山丘上挖观音土。我也跟着爸爸去了。去挖土的人真多啊！人们把挖回的土掺上点面、菜，吃起来虽然苦涩难咽，吃下肚却能充饥。我吃了几天，小肚子胀得生疼，胃里就象放了块石头，好几天都拉不出屎来……

到了夏秋两季，我家的日子才好过些。爸爸白天给人家烧饭，后半夜，他借着朦胧的月色，到新桥港去打鱼。我有时也跟了去。爸爸总是选一个水流较缓的地方，把吊网放到河里去，有时也能打上一些鲤鱼、鲫鱼，天明就拿到镇上去卖些钱。在下雨之后，他也能在小河沟里，捉到一些黄鳝、泥鳅，再挖些野苕菰、芋头，一家人凑和着吃一顿。

我们后园村就在镇子边上，有时有一些京剧、淮扬剧以至文明戏班子，到镇里的关帝庙、城隍庙来搭台演出。我和村上

的小朋友，总是要挤进去看的。我最喜欢的是《赵子龙单骑救阿斗》、《岳飞大战金兀术》、《草船借箭》这些折子戏。有些鬼戏和《义犬记》之类的戏，我也很爱看。

我们家乡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。我的几个叔伯哥哥和村上几个老年人，经常给我们孩子讲这些故事，有历史的、民情风俗的，也有神鬼的、荒诞的。苏北地区气候炎热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天气凉爽一些，我们一群孩子，就要聚集在河边场院上听故事。听到端午节为啥吃粽子、牛郎织女“七夕相会”、“留头不留发”以及“海螺女与渔郎”等故事，我们总是心旷神怡，兴趣盎然；听到那些鬼怪的故事，我们又爱听、又害怕，听完了都不敢独自回家，缠着大人送我们回去。这种“听故事”活动，对我是有影响的，以后我一直爱听故事，也爱给孩子们讲故事。上学识字以后，我在作文中曾记下一些故事，同时又开始饶有兴味地读一些民间唱本和演义小说，这也就是我接触文学的开始吧。

烧山芋、放风筝、倒猛子

我家的二亩薄田，一亩在地藏庵坡下，一亩在地藏庵坡上。坡下的一亩，每年种冬小麦，第二年端午节前后，收割了麦子，就插种晚稻。坡上的一亩，春末收了豌豆、油菜、就种高粱、豆子、山芋，地堰上种些蚕豆、芝麻。

每年收麦、插秧季节，农活格外忙，我也参加割麦、送秧劳动，还帮助爸爸拉鸡公车，把庄稼送到场院上。干了活儿，在地头吃饭特别香。收小春时，我就摘点豌豆吃。秋后收了山芋（即红薯），我和妹妹拣些枯草，在地头烧山芋吃，又鲜又甜又香，城里的孩子绝享不到这种口福。

我的家乡，有放风筝的传统。每年春天“踏青”时，是放风筝的季节。我和我的小朋友蔡广连、葛宗权等人，都要带着各自扎的纸鸢、蝴蝶、八角等风筝，一起到野外去放，我们比赛谁放得最高，有时还在风筝上安上竹箫，风吹着能发出“呜呜”的叫声，组成一曲动听的音乐。

我的二伯父是个歪脖儿。据说，他在少年的时候，和村里十几个孩子，一起放过大八角风筝。那风筝有一丈多高，尾巴有好几丈长，得用小手那么粗的绳子放。风筝上绑了八个响铃。有一天，有一个顽皮鬼，和七八个牵绳的孩子事先串通好，风筝上天以后，他们七八个人一齐撒手，我二伯父不知道，还是紧紧拽住绳子不放。风筝的牵力太大，把他拉了几十丈远，最后把他拽到一棵大树上去，脑袋卡在枝丫间，把颈椎拽伤了，从此就成了歪脖儿。

家乡的港、河、湖、汊多，每个男人几乎都会凫水。我的爸爸就是一个游泳能手。据说，有一个夏天的晌午，他佯装在新桥口的栏石上睡觉，忽然翻身跌下河去，桥上的行人都以为他失身落水，一些青年人纷纷下河救他。人们正在河里打捞，他忽然出现在桥上，对大家说：“你们不用找了，我在这里哩！”大伙儿都骂他不该开这样的玩笑。

我在四、五岁的时候，就下塘学游水了，开始在浅处学打扑腾、狗爬式，后来就学踩水、倒猛子。有一次，我倒猛子的时候，把脑袋插到烂泥里去了，脚又抽了筋，结果喝了几口水，把小肚子灌得鼓鼓的，若不是小伙伴来搭救，我的命早“呜呼”了。从此，父母亲怕我出事，再不让我下塘游泳。可过了一阵，我还是照样下塘、下河游水。

我小时候学会了游水，到了少年时期，就能在长江、海边

上游泳。有一次，在四川江津的长江边上，我随着孩子剧团几位团员，向下游游水三里多地哩。

我的家乡，民间文化生活比较多样。人们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演出：春节的“唱麒麟”灯会，端午节的赛龙船，七月十五日的（鬼节）的盂兰会、中秋节的赏月……与此同时，封建迷信活动也很普遍：祠堂寺庙的祭拜、算卦、相命……测字先生经常串村走巷。在这些风俗的影响下，我小时候又信神，又信鬼。我的长辈们，对神明菩萨非常虔诚，我五岁那年，患了严重的隔日症。家里人都说，鬼附在我身上了。每隔一天发病时，全身冷得发抖，爸爸就赶忙背着我，跑到城隍庙或大殿寺去，在殿堂上转来转去，好让神明、阎罗王，把小鬼从我身上祛去。直到我全身不发抖了，爸爸才背我回家，从不吃任何的药品。说来实在叫人好笑，这是多么愚昧的举动啊。

私塾和戒尺

我的家乡地处长江沿岸，水陆交通比较发达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人民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也多了。我记得，这个小小的口岸镇，当时就有两处完全小学、一个中学。每个村几乎都有私塾，上学的儿童是相当多的。

我的家境贫寒，父母亲认为，自己再苦，也要送孩子去上学，期待着某一天的“时来运转”。

口岸镇后街上，有个不大不小的地主李玉堂。据说，他本人曾在清朝时赴考中了秀才。他们的家业既丰，又以诗书传家。他自己长期开办私塾，教育了不少少年儿童。我去读私塾的时候，李玉堂因年迈已把教职移交给他的长子李秉乾。

我们念的课本有：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大学》、

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幼学琼林》。李秉乾执教很严，对我们学生凶得很。我们每天早上一到私塾，先要向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”的牌位，行九十度的鞠躬礼，然后向他行礼、问安。然后学生轮着背书，谁要是背不出来，他就用红木戒尺打手心。我还是比较用功的，但要把一部《论语》从头背到尾，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难免口结、背错，所以也得伸出手心，让他用戒尺抽打，有时打得手肿得象馒头一样，还不许你哭。

我们一个个学生，都恨死了那戒尺。有个淘气的同学，趁老师不在的时候，把戒尺锥了几个小眼，把蛀虫放进去，再用面筋糊上，涂上桔红色，一点看不出痕迹。过了半年多，李先生打一个学生手心时，竟把戒尺打断了。我们从心眼里高兴，李先生还不知道戒尺是怎样断的哩。

儿童的天性好动，爱游戏。我们私塾除了读书、练字、学算盘、做诗文，没有一点唱歌、体育的课程。我们学生喜欢的捉迷藏、摔洋画片、捣铁、扯哑铃、骑人马……都只能在放学以后玩儿，还不能让李先生知道。1927年的秋天，国民革命军为追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队伍，挺进到我的家乡。这些年轻的革命军人，允许我们孩子摸他们的枪、看他们的战马，还教我们唱《打倒列强歌》，我们唱得真快活啊：

打倒列强，
除军阀，
国民革命成功
齐奋斗！

使人不高兴的是，这些队伍很快就开走了。

一天下午，李先生带着推车的长工，到乡下收租米去了。

“阎王”一走，我们这些“小鬼”可解放啦。我们在私塾的院子里穷追、乱嚷，又学着国民军走步、下操。忽然，有一个调皮鬼高声喊着问：“我们来玩‘打江山’，好不好呀？”

“好，好！”我们兴奋地一齐吼着。

大家立刻把教室里的书桌、板凳，统统搬到院子里来。然后把它们摆起来，搭成一个三、四层高的“宝塔”，塔顶上放着李先生的红漆坐椅，谁要是最先爬上去，又不让别人上台，坐到那“宝座”上去，那就打下了“江山”，算作胜利者。

我们起劲地玩儿着，一次又一次地往上冲，踩坏了一些桌椅，好几个“大力士”从“宝座”上摔下来，哇哇喊疼，可是大家玩儿得很高兴。

我们又玩儿起捉迷藏：大家围一个圆圈，选出六七个大同学，他们中间抓到阎的人，用手巾蒙上眼睛去捉别人。看到他在追逐中的滑稽动作，可把大家乐死了。

“不好了，李先生回来啦！”有人惊叫起来。就象小耗子见了猫似的，同学们纷纷逃窜。那个蒙了眼睛的同学，还在拼命地追人，他一个箭步上去，把李先生牢牢抱住。李先生揭掉他脸上的手巾，啪啪地打了他几个耳光……

我们每个学生都挨了戒尺，教室里一片嚤嚤的啜泣声……

这是个道地的封建私塾，它的纪律是靠戒尺来维持的。不过，我还要感谢这个私塾，五年多的严格学习，使我打下了语文的基础。

临青、我的母校

长江，是我国最长最长的一条内江，它灌溉着两岸广阔的

田地。可在旧社会，由于得不到治理，它也时常泛滥成灾。

1931年7月，长江发生了百年来未遇的水灾。雨量过多而且集中，使得长江下游几省广大地区尽成泽国。我记得一天深夜，忽然听到汹涌而来的水涛声，也听到人们惊慌的呼救声，我们一家人，还来不及起床下地，大水已经淹到屋里来，不久水便深过半腰了。不知多少房屋坍塌了，也不知多少人遭到灭顶之灾。

口岸镇附近的大水，有一个多星期才逐渐退走。我家田园里的庄稼和蔬菜，已经荡然无存了。田里颗粒无收，家里生活极度困难，只得求亲靠友、变卖东西，后来债台高筑，不得不卖掉二亩薄田，最后又卖掉全部房屋。1933年的春天，除我留住姑母家继续念书，一家人都逃荒到上海去了。

我是1934年夏季到上海去的。当时我的全家住在沪东平凉路九大头日本纱厂的工房里。我父亲给人烧饭，我的两个姐姐在日本纱厂做工。我年纪小，才十二岁，就拾垃圾、当小杂工。在家乡时，我念过五年私塾，现在看着小学生们每天大清早背着小书包，蹦蹦跳跳地上学，心里是多么羡慕啊！我要读书的愿望，爸爸妈妈也支持，可他们整天忙着吃喝，也不懂洋学堂的规矩，只说：“你去试一试吧！”

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，我看到沪口小学的门口贴着招生的广告，就走进了校园的招生处。我对窗口里的老头儿说：“老伯伯，我要报名……”

那老头儿抬起了老花镜，对着穿得破破烂烂的我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把一只长胳膊伸出窗外，用浓重的上海腔说：“拿来！”

我有点莫名其妙：“什么拿来？”

“学杂费、书费！”

“要多少钱呀？”

“统共七块六角九！”

“噯哟！七块六角九分，这么多钱！可我身上只有几角钱，家里也拿不出这笔钱呀。我悻悻地走出校园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难过地呜咽起来。上海的学校，哪是穷孩子进的呀！

我只好又背起背筐，拿起铁丝夹子，拾起垃圾来。

1936年初春的一天上午，我背着筐子走进顺城里弄，看见不少孩子到临青学校去报名，便信步跟着他们走去。孩子们一个个报了名，我还站在那里观望，不敢向注册室迈一步。

一个留着短发，身穿毛衣的胖胖的女教师走到我的面前，和蔼地问道：“小朋友，你也想念书吗？”

“想念。”我的声音很低，很低。

“那你报名嘛！”她说的一口四川话。

“我……没有钱……”我胆怯地回答。

这位女教师爽朗地笑起来。她问了我的学历和家里是做什么的以后，对我解释说，临青学校优待工人子弟，家里有困难，可以免交学杂费。她把我带进注册室，替我报了名，又代我交了书钱，领了语文、算术、常识、英语一套书，放在我的手里，对我说：“你编在三年级一班，我就是你们的级任老师，你明天一早来上学吧！”

我高兴得流下了眼泪。入学了！入学了！这不是做梦吧？我真不知道怎样感激她才好。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人，这样的好学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刘筱圃老师，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，临青学校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——社联所办的学校。办这学校的目的，是开展沪东区的抗日救亡运动。